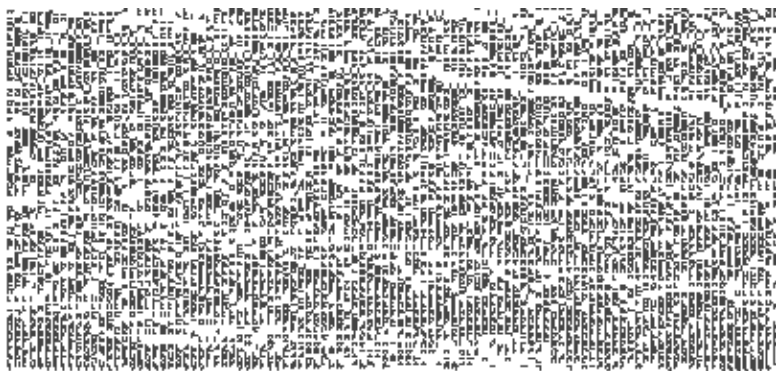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司马法》——我国军事法典的鼻祖

田旭东



《司马法》是我国先秦时期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兵学典籍,亦称《司马兵法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称之为《军礼司马法》,列在《六艺略》的“礼”类,而不象其他如《吴孙子》(今《孙子兵法》)、《齐孙子》(今《孙臆兵法》)那样被列在《兵书略》之中。据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,原书是“齐威王命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,而附穰苴于其中,因号曰《司马穰苴兵法》”,可见该书的成书时间是在战国中期的齐威王时,即公元前356年——前320年之间。

那么,齐威王为什么要附穰苴之法于《司马法》之中呢?《史记》讲到:“司马穰苴者,田完之苗裔也。”齐景公时,晏婴以“文能附众,武能威敌”荐田穰苴于景公,景公“与语兵事,大说之,以为将军,将兵扞燕晋之师。”“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。”于是尊为大司马。其后人田和“因自立为齐威王,用兵行威,大放穰苴之法,而诸侯朝齐。”所以,齐威王要“使大夫追论古者《司马兵法》,而附穰苴于其中,因号曰《司马穰苴兵法》。”若仔细考察,司马穰苴与《吴孙子》《齐孙子》的作者孙武与孙臆实有一定联系。据杨伯峻先生考察,在齐国,陈、田、孙三家属于同一始祖,可以认为是同族。穰苴是陈国田宗的后裔,田完的另一裔孙田书,也在齐景公时伐莒国有功,赐氏为

孙。以后到吴国的孙武即为其后人,而孙臆又是孙武的裔孙,在齐威王时任职,战功显赫。作为威王时最重要的军事家孙臆,在《司马法》的编著中起了很大作用。《司马法》中有许多先秦军法制度的条文。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:“后世耀金为刃,割革为甲,器械甚备。下及汤武受命,以师克乱而济百姓,动之以仁义,行之以礼让,《司马法》是其遗事也。”《司马法》中大量有关军礼的内容,是先秦军礼的综合性总结,在进入以儒家为正统的汉代,这部兵书被班固归入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六艺略》的“礼类”。

从书名来看,《司马法》与《孙子》《吴子》等以人名命名的兵法书不同,它以古代掌管军政事宜的司马官(如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中分有若干司马之官)为书名,可见它所记录的就不是一般的个人对战争规律、经验的认识和总结,而是以司马之职的官守为内容的军中制度与法规。今本《司马法》仅有三卷五篇,大量的记录军法(或称军礼)的内容则在《司马法》逸文之中,逸文主要为清恰巧人张澍、黄以周和钱熙祚所辑,大约有60余条,大致反映的古代军法有以下内容:

(1) 军队编制 即对兵员及战车进行自下而上的编制,设置官职,明确职掌。

(2) 军赋制度 即根据户籍制度,畿服

制度征发士卒、车马等出军定赋。

(3) 出师 包括出师时令、事由、目的、出师之前宜社、造庙等祭祀活动。

(4) 指挥联络。包括旌旗、金鼓、徽章等。

(5) 誓师

(6) 军容与军中礼仪。

(7) 校阅蒐狩。

(8) 凯旋、献捷、献俘。

(9) 军中禁令。

(10) 军威

(11) 赏罚

(12) 止语

在今本《尉繚子》的后半部分,如《重刑令》、《伍制令》、《束伍令》、《勒卒令》、《兵令》等篇章中亦可以看到属于军制、金鼓、旌旗、徽章、赏罚和军中礼仪的内容。出土资料以

1978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所出的竹简最为宝贵,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军法、军令的实物证据。而《司马法》所反映的古代军法内容最为全面。古代的所谓礼,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,更多的则是国家的政治、军事等制度和法规,礼与法并无明确的界限。按《周礼》,礼制的管理属于大宗伯,其记载将礼分作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类,称五礼。《司马法》在许多方面与《周礼》相表里,正好记录的是军礼的内容。班固著《汉书》时认为《司马法》是对商周两代以礼治军的总结,他说:“自春秋至于战国,出奇设伏,变诈之兵并作”,这才出现了大量的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方面的兵书,所以他把《司马法》与这四类兵书相区别而另列入礼类,并称之为《军礼司马法》。清代学者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卷二〇说:“是《司马法》,实古军礼之遗文,故足与礼经相证。”秦蕙田的《五礼通考》,黄以周的《军礼司马法考证》、《礼书通故》也都是把《司马法》当作礼书来研究,力求恢复古代军礼的本来面目。比如《司马法》中明确记载有以下古军礼内容:

关于出军定赋的:

“六尺为步,步百为亩,亩百为夫,夫三

为屋,屋三为井,四井为邑,四邑为丘。丘有戎马一匹、牛三头,是曰匹马牛。四丘为甸,甸为六十四井,出长毂一乘、马四匹、牛十二头、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二人,戈楯具,谓之乘马。”

关于出师时令的:

“春不东征,秋不西伐,月食班师,所以省战。”

关于军中礼仪的:

“兵车不式,遭丧不服。”

“介者不拜,城上不趋,危事不齿。”

“其有限命,以行礼如会,所用仪也。若陨命则左结旗,司马授饮,右持苞壶,左承饮以进。”

关于军中禁令的:

“阃外之事,将军裁之。”

“进退为时,无曰寡人。”

当然,其中也不乏有在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“逐奔不过百步,纵绥不过三舍,是以明其礼也,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,是以明其仁也,成列而鼓,是以明其信也。”“战道不违时,不历民病”,“不加丧,不因凶”等在早期战争中确实实行过的军礼。以至于到春秋时还有恪守“君子不重伤,不禽二毛”,“不鼓不成列”等古军礼的宋襄公,在宋楚泓水之战中丧师陨兵而为天下笑的例子。

《司马法》中所记载的关于我国最早的军法内容,对后世影响极大,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上讲穰苴“行军勒兵,申明约束”,《孙子列传》上讲孙武“约束既布,乃设斧钺,即三令五申之”等,都可认为是指这种军法制度。西汉初年“萧何次律令,韩信申军法”,实际上就是对《司马法》的因袭和补充。清末学者沈家本辑有《汉律摭遗》,其中就有《汉军法》,从其所辑内容看,大部分与《司马法》相似,基本上未出《司马法》的范围,可见汉代军法是本之以《司马法》的。不仅如此,它还还为后世社会军中法令条例的设置规定了基本范畴,对中国古代军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。

(作者通讯处:西安市西北大学文博学院)